

郁江与上源的邕江相比，河面更宽广，水流更平缓，两岸的冲积平原也更加开阔。相隔着较宽广的、长着丰茂绿色植被的低矮山坡后面，才是高大的山脉。郁江是温婉而宁静的，一年之中的多数时间河水都是清澈透明的，它像伟大的母亲一样静静地用甘甜的乳汁滋养着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当然有时它也会显得热情奔放，每当洪水季节，夹杂着大量泥沙的黄褐色河水湍急地向下游奔驰，同时也把上游的部分淤泥丢弃在两岸，年复一年自然形成了大片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壤。

郁江原始文明的考古发现没有太多的传奇故事，但却有着太多的艰辛和汗水。于是，考古学家终于证明了以下的史实。

大约在六千年前，最早的原始农民就在郁江两岸定居下来了。到了战国以后，郁江平原地区的经济已经开发。由于贵港处于珠江流域中段，是古代交通和货物集散的重要内河港口，所以，这里秦代是郁林郡治和布山县治，汉代仍是郁林郡治和布山县治，并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十分繁荣的中心。

郁林郡治和布山县治是否就在贵港呢？这是一个有歧义的历史疑案。有人认为布山县在今贵港，也有人认为是在今桂平。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设置的郁林郡所辖十二县，布山县排在第一位，即是首县。这是史籍中关于“布山”地名的最早记录。按照惯例，排名首县的也是郡治所在，因此它既是布山县治所，也是郁林郡的治所。但是关于布山县的具体位置，《汉书》和《续汉书》都没说，只是到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郁水》才有所提及。他说，郁水“东迳布山县北，郁林郡治也。……又东入阿林县，潭水注之”。由此可见，直到北朝时布山县仍是郁林郡治之所。据

清代学者考证，郁水即今郁江，潭水为今柳江。布山县在郁水之上游，下游则为阿林县，而阿林即今桂平，布山也就是今贵港了。但《旧唐书·地理志》却说：“桂平，汉布山县，郁林郡所治也。”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也跟着这样说。197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把汉代的郁林郡治（即布山县）标记在桂平县西南，显然是采用《旧唐书·地理志》的说法。由于在今贵港市郊四周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并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说明贵港就是当时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中心。这符合凡四周有密集古墓群的地方往往皆是郡县治所地的一般规律。因此，更多学者相信汉代的布山就在今贵港。但是，随着桂平境内一些考古文物的新发现，自然引起人们思考为什么唐代人会说汉布山县在桂平。如1980年5月，考古工作人员在桂平城厢东村以东三角嘴一带发现汉代绳纹瓦片；1983年6月，在桂平大塘城发现了汉代瓦片和绳纹下水管道；1996年10月，在桂平寻旺乡大塘村西郁江与黔江交汇处的右岸发现了汉代墓葬和窑址。这些迹象表明桂平在汉代也曾是繁荣之区域，于是有人推断或许最早的布山县治也曾一度设在今桂平，但是很快就迁移至今贵港了。

贵县古墓群广泛分布在今贵港高中、贵港糖厂、风流岭、大公塘、罗泊湾、南斗村和铁路桥一带，范围南北2.5公里，东西7.5公里，连绵不断，是广西最大的古墓群之一，现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54年以来，发掘的汉墓已达400多座，出土了陶瓷、铜、铁、金、银、滑石、宝石、竹、木等各种质地的珍贵文物1万多件。

说到贵县汉墓发掘，就不能不提及贵县罗泊湾一号墓的发掘。因为它是迄今为止，贵港乃至广西地区已发掘汉墓中墓葬规模最宏大、墓主人身

份地位最高、出土文物最为精美的一座。罗泊湾在今贵城镇的东面，是郁江自西向东流经县城后稍向东拐的一个大湾。郁江南岸有一村落叫罗泊湾村，罗泊湾墓区则在郁江北岸与村隔河相对。罗泊湾一号墓的馒头形封土堆十分高大，残高约7米，底径约60米，估计原来土堆应高达10米。当地人称此9堆为大坡岭。1976年6月，贵县化肥厂扩建厂房，涉及大坡岭南侧，在挖土过程挖出了一些镏金的铜车马器，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和重视。同年7月上旬起，广西区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开始主持这座汉墓的发掘。清理像小山一样的巨大墓葬，需要大量的劳力来搬运泥土。因此，当地的机关干部、工人、学生、附近的驻军都组织起来，参加了挖掘过程的泥土搬运。

通过连续的、艰辛的、长达数月之久的科学发掘，终于让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大墓重见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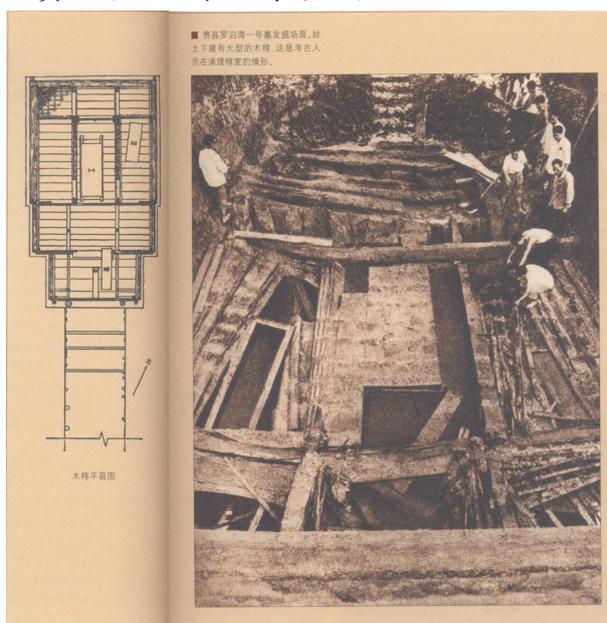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是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在封土下面的巨型木椁便镶嵌在平面呈“凸”字形的墓坑中，一条长达40多米、宽约3米的斜坡墓道与墓坑南面正中相连。大量的殉葬品和装着尸体的棺材都能通过此墓道方便地运送进来。墓道尽头东侧不远处发现一个埋藏有车马器的坑，或许当时掩埋的是实用的马车，不过出土时只剩下车轮的痕迹和一些镏金的铜质器件。

木椁实质是一个放置棺材和随葬品的木屋子，它是用粗大、厚重的木板、木柱、方木采取卯榫结构的方式搭建，用隔板分成前、中、后三室12个椁箱。椁室有盖，盖板是用28根大方杉木平铺而成，其中最大的一根长达7.4米，宽0.48米，厚0.3米。这些木方条是如此沉重，当然用现代的

起重机可以轻易地吊起，但如果只靠绳子和扁担，则需 20 个健壮的劳力才能抬动一根。由此可见在古代这座坟墓的建造是一项耗费人力、财力的浩大工程。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两千多年前的广西曾是一个植被丰茂的绿色世界，那时候生长有许多高大而挺拔的杉树，而今天的广西，再也难寻觅到如此粗大的杉树了。椁室四周均填塞了厚达 5~15 厘米的青灰色膏泥，盖板上也铺有一层膏泥，上面再铺有一层 8 厘米厚的草帘，草帘之上盖一层厚达 25~40 厘米经夯实且烘烤成硬壳的黏土层。可能是厚实的防护层使椁木的氧化和腐烂的速度减缓，因此出土时不少椁木依然保存良好。



###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封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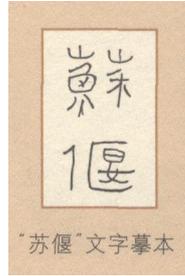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场面。封土下建有大型的木椁，这是考古人员在清理椁室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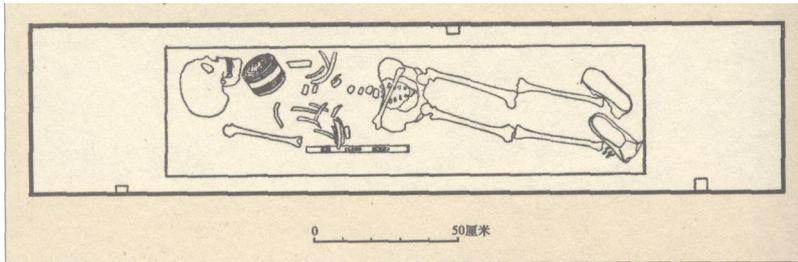
椁室内有三具棺木，其中两具分别置于后室的中厢和边厢，一具却在前室的中部，但死者的尸骨已腐朽无存。主棺为外髹黑漆、内涂朱漆两重棺，这应是用来安葬墓主人的，而其他两具有可能是为他殉葬的姬妾。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在椁室的底板下面，还发现了七个殉葬坑，坑分前后两排，每坑置棺木一具。棺木有方棺和圆棺两种，其内各安置尸体一具。尸体只用竹席或草帘包裹，但骸骨保存完好。七具殉葬人骨架经医学专家鉴定，六人是16~26岁的女性，只有一人是13岁的男孩。有两具圆棺的棺盖上分别刻写或书写有“胡偃”、“苏偃”的隶书文字，两棺内均有简单的随葬物，但“胡偃”的右臂侧置有一支竹笛。“胡偃”、“苏偃”可能为死者的姓名，她们极有可能是墓主人宠幸的乐舞伎。死者的遗骨没有发现伤痕和骨折，她们入殓时身首当完整，其死因应是用药物毒杀所致。殉葬本是一种古老的风俗。最初人们只是将死者生前用过的物品随葬，但随着私有财产的积聚、阶级的出现，个人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极度扩张，用人殉葬便开始出现。人殉的风气在商代达到了顶峰。商代前期人殉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到了后期，大中型墓葬几乎都有人殉。但残杀奴隶殉葬在春秋战国时开始受到社会舆论的反对。公元前384年，秦献公提出禁止以人殉葬后，到了汉代，中原地区已基本废除人殉陋习。但两广地区在西汉早期属独立割据的南越国管辖，汉朝法律对于南越国权贵们的约束力极微弱，故尚保存以人殉葬之风。广州南越王的墓中，有四个夫人殉死，十一人殉葬；而贵县罗泊湾一号墓的主人大约只是南越国郡守、郡尉等级别的官吏，竟然也有两个姬妾从死，七人殉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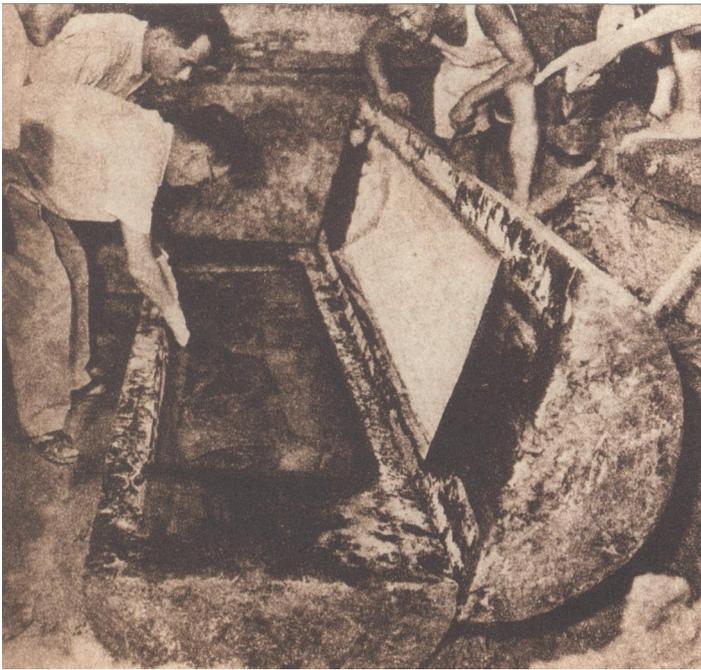
“胡偃”拓片



“苏偃”文字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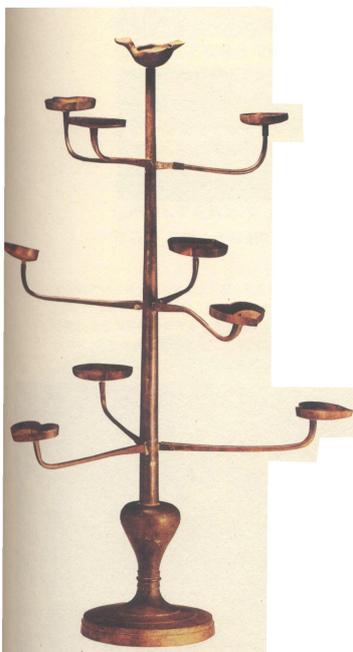
■图中绘画的是胡偃木棺内骨骸和随葬品放置的位置。这具木棺系用一根圆木剖为两半，中间凿出长槽而成。棺盖上刻有“胡偃”二字，当是殉葬者的名字。经鉴定，死者为 25 岁女性。其右臂处有一竹笛，估计此女生前为歌伎。



■殉葬坑二号木棺揭开棺盖的情形。该棺棺盖面有墨书“苏偃”二字。经鉴定，死者为年仅 18 岁的女性。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葬因早年被盗，有许多文物已被盗走，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但是墓中仍然保存有不少铜器、陶器、玉器、漆器、纺织品等珍贵文物，其中的一些精品世所罕见，具有较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如出土的树形铜灯既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也是一件实用灯具。灯呈树形，通高达85厘米。它的主干为圆柱形，上细下粗，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从主干分三层伸出九条支干，每支顶托一叶形灯盏。主干顶端则有鸟形灯盏。干、枝、叶、鸟分别造，用卯榫套扣，合成一体，可自由装卸。此灯的形态极像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扶桑树。《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件铜灯正好九枝在下，一枝在上，故有人又称它为扶桑树形灯。中原内地的汉墓亦有相类的多枝树形灯具，有三枝至十三枝不等，有高达一米的。灯盏错落有致，点灯时，灯火交相辉映，有如花树，尽显华美、豪华气派。



■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制扶桑树灯。此灯造型优美，工艺精致，创意源于古代神话说中的扶桑树，是汉代富有创意的实用灯具及工艺品。

在铜器表面用黑漆绘图案的装饰手法在汉代并不多见，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盆和提梁铜筒上就绘有精美的漆画。铜盆为平口、宽沿、圜底，外壁以四对铺首分隔四组漆画，每组漆画既自成一画面，又互相关联。其题材似乎叙述的是某场战争的历程。画面中有两人持械争斗，亦有人兽搏斗，有坠于马下的骑士，也有遗下主人狂奔的战马；有盘膝而坐的主人，还有前来参谒的部下。提梁铜筒形似竹筒，圆柱形，中空，平底，有盖，器身环漆绘四组叙事画。画面似有狗、奇兽异鸟，也有人或神立、坐、走、骑兽的各种形态，还有一些卷曲而流畅的线条构成的云纹图案，似乎表示这是一个人神共处的神话世界。尽管画面的内容、主题、寓意尚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所绘的图像线条流畅、形象生动，有的人物形象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相似，画风笔意明显是承袭楚国漆器绘画的传统。



■ 贵县罗泊湾出土的这件具有民族特色的漆绘竹节铜筒，筒体有三道等距的竹节纹，形状与岭南少数民族劳动时携带的盛水盛粥的竹筒极为相似。环绕筒身绘有四组漆画，画中人或神或兽均出没于缥缈的云气或巨浪之中。

漆器是该墓中出土的色彩最为艳丽的器物，虽然其中残片多而完整者少，但不少可以复原出原貌。漆器的器型有耳杯、盘、盂、豆、桶、奩、梳篦盒等。红、黑二色是漆器的常见颜色，纹饰细腻、流畅，与湖南汉墓出土的漆器十分相似，具有明显的战国时代楚器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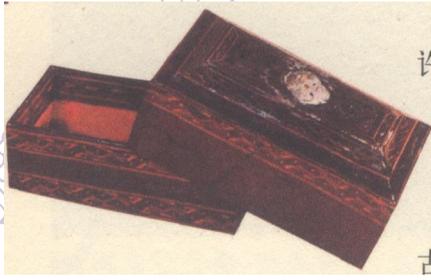


铜盆展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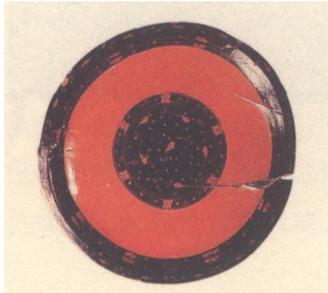
### ■铜盆展开图



■这件铜盆是从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椁底下随葬器物坑中取出。通高 13.5 厘米、口径 50 厘米，底径 44.5 厘米。上腹部有两对对称的铺首衔环。内底有匀称的辐射线，说明该器是冲压成形的。内外壁均以漆绘画，漆画表现的是一个神共处的世界，绘画风格与楚国漆器的图案相似。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方盒。木胎，长方形，有柿形铜扣带环盖。外髹黑漆，以红、赭两色描绘制饰花纹。内髹红漆。工艺十分精美。



■漆盘（盛器）。木胎，宽沿、敞口、浅腹、平底。外髹黑漆，仅内腹下部髹红漆，以红、褐等颜色描绘各种精致花纹，其图案极其生动流畅。



■漆奁。可盛放梳妆物品，它以卷木为胎，圆筒形，有盖。器表髹上光亮黑漆，以红漆描绘花纹，内壁髹以红漆，显得华丽而高贵。

当然，值得介绍的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珍贵文物还有许多，但已非本章节的篇幅所能容纳了。诸如通过出土的大量植物遗迹可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通过出土的竹笛、钟、鼓等乐器可研究当时的乐舞，通过出土的麻、丝织物可研究当时的纺织工艺……还有许多东西仍需要考古学家进行更深入、长久的探索才能悟出其中的奥秘。不过，仅此也足以说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其奢华的生活，也反映出作为汉代郡、县所的贵县，确实是经济

发达、文化繁荣的重镇。

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是西汉前期墓，贵县当时仍属南越国赵佗辖地。自元鼎六年（前 111 年）汉武帝平南越设郁林郡、布山县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贵县的交通运输和商贸活动日益繁忙，一直都是广西较为发达的商贸都市并延续至今。

## 美丽的贺州

媒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对人们的行为会有神奇的导向作用。以广西贺州的绮丽风光为外景的香港电视连视剧《茶是故乡浓》热播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为品尝到甘纯的茶香，回味浓浓的乡情，寻找那令人赏心悦目、心醉神迷的绿水青山，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的游客纷纷进入贺州，一时之间，贺州竟然人涌如潮，客房爆满。

贺州市原为贺县，位于广西东部，下辖八步区、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和昭平县，总面积 11855 平方公里，总人口 210 万。市区面积 15 平方公里，人口 10 多万，楼房林立，霓虹灯闪烁，已凸显一个现代化都市的风貌。

贺州地区的秀丽风光是出了名的。游客或踏入青葱翠绿、瀑布飞溅的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或登临江心兀立、怪石嶙峋的浮山，或漫步于有世外桃源之称的昭平黄姚古镇的青石板街，无不心旷神怡，流连忘返。然而，更令人难忘的还有悠久的古代文明。

众多的石灰岩洞、丰富的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使贺州成为原始人类良好的栖息之地。据考古调查，贺州、钟山、富川、昭平等地的山坡、洞穴

及河旁台地中都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踪迹。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现遗址40处之多，出土了夹砂绳纹陶片、打制及磨制的石器。其中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茶家村鲤鱼嘴出土的穿孔磨制石斧制作得十分精致，显示了较高的石器工艺水平。



■昭平县黄姚古镇是广西古代名镇之一，今属贺州市昭平县的辖区。它的得名与自明代起黄、姚两姓人一直在此居住、生息、繁衍有关。这里山清水秀，植被丰盛，空气清新，民风纯朴，建筑古朴，处处透露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浓郁韵味。

这里是湘、粤、桂三省区毗邻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化传入广西的重要通道。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巡狩南方，首自湖南进入贺州，死后归葬九疑（一作“嶷”）山。在今贺州境内，就曾发现有名为“九嶷”

之山。据《贺县志》载：“九嶷山在县东北三十里，俗讹呼狗儿山，南将及顶，有池宽数亩，深不可测，前有悬崖，池水下流成瀑布，名白带硖，至此遂难攀涉。遥望幽谷，罗列万状，云气吞吐。”有人认为贺州九嶷山为舜帝的埋葬之地。舜帝的传说，反映了中原民族和岭南土著民族交流的历史。

西周、春秋时期，贺州地区广泛分布一种约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又早于汉代的印纹硬陶。印纹硬陶的纹样丰富，常见的有篮纹、回纹、米字纹、雷纹、羽状纹、回字羽状纹、编织纹、菱形纹、夔纹等。考古学家认为，广西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是当地最主要的陶器纹饰，而印纹硬陶是属于一种外来传人的文化因素，是受到湖南、广东等地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制陶新工艺。

1976年在桂岭镇英民村出土一件青铜铸，系西周时期的遗物。据《贺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在今黄田镇里松村曾出土一件云雷纹乳钉铜甬钟，从纹饰推测可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物。

1980年在铺门镇陆合村贺江边有群众在劳动时发现青铜斧十三件、青铜钺五件、镞两件。这些零星的青铜器的出土使考古学家闻到贺州灿烂的青铜文明的气息。然而，它们究竟埋藏在什么地方呢？有哪些地方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呢？

1991年贺州沙田镇龙中村附近岩洞出土的一批精美的战国青铜器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沙田龙中岩洞中发现青铜器纯属偶然。一个在山上劳作的农民看到一只奔跑的狐狸钻入一山洞后便消失踪迹，农民也追踪进入山洞，发现洞中赫然摆着一些精美的青铜器。青铜器共有十八件，计有铜鼓、铜牺尊、铜鼎、兽首盃、罍、凤字形铜钺、环形器、龙形器耳、兽头形器

耳、箕形器、勺形器、叉形器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处岩洞葬。从陪葬的器物看，墓主的身份是很高的，并非普通的平民百姓。墓中出土的青铜鼎有三件，在中原地区，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祭祀用具。



■ 这是贺县龙中岩洞葬出土的一件铜盃。它直口，有盖，广肩，兽头流，扁圆腹，圜底，三兽足。流为短曲状的抬头兽首，椭圆形吻，鸡冠形角，三角大耳，三角眼，鼻侧有须，颈部饰鳞纹。盃为棱脊形，镂成空心的蟠螭纹。通高21厘米。造型、纹饰都十分精美。铜盃是古代中原地区常见的一种酒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它的出土说明了贺县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传入广西的一条重要通道。

080 溯源系列 ● 丝路古港 从合浦起航

■这是贺县龙中岩洞葬出土的一件铜盃。它直口，有盖，广肩，兽头流，扁圆腹，圜底，三兽足。流为短曲状的抬头兽首，椭圆形吻，鸡冠形角，三角大耳，三角眼，鼻侧有须，颈部饰鳞纹。盃为棱脊形，镂成空心的蟠螭纹。通高21厘米。造型、纹饰都十分精美。铜盃是古代中原地区常见的一种酒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它的出土说明了贺县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传入广西的一条重要通道。

铜牺尊、铜罍、铜盃与铜鼎一样也是青铜礼器。龙中墓出土的这件铜牺尊很有地方特点：此尊高53.7厘米，长48厘米，足高13.4厘米，整体形状像一只怪兽，背部有口，可由此处把酒注入腹腔内，口上有活动的盖，盖面有盘蛇浮雕，蛇身饰三道鳞纹，居中高昂蛇首为盖纽。尊的头部形状古怪，张颌露齿，双目圆睁，有双角，圆柱形，尊的尾部有一直立攀附的小龙。整体纹饰内容充满了浓郁的古越文化特点。1993年该尊被送到上海

参加“中国文物精华展览”，引起了轰动。其图片被制成广告招贴画，上海《文汇报》以“国宝，倾倒申城观众”为题，评说此尊“形式之奇，器形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创制”。

1992年当地工人在沙田镇高屋背岭岭西山冈挖土时，又意外掘出了米字纹陶瓮及30多件青铜器，有斧、镞等器型。考古学家敏锐地意识到，沙田镇一带有可能是当时贺州青铜文化较发达的区域，其地下可能有墓群，并掩埋着更丰富的文化遗物。

2001年11月，由广西文物队和贺州市博物馆的考古专业人员组成的野外调查队开始在该地区展开田野考古调查、钻探、发掘。最初的勘探是从高屋背岭的岭西开始的。高屋背岭为一片凸起的丘陵土坡，正好镶嵌在临江河和支流马蜂河交汇的三角地带，东南距现贺州市只有5公里。据村民说，数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青葱翠绿的松树林，地表有许多像馒头状的土堆。但现在这里几乎已平整为耕地了。

考古学家凭肉眼是无法看见深埋于地下的古代文物或古代墓葬的，但用打探洞取泥样标本观察方式就能够了解该区域的地下墓葬、文物分布的情况。勘探首先集中在高屋背岭岭西山冈，在不到3万平方米的范围，以梅花桩布孔，孔间距一两米，钻探了2万多个探洞。钻探的结果是令人惊奇的，共发现了129座古墓葬。因此，估计高屋背岭这一带墓葬数量在300座以上。为了证实墓葬的情况，选择了钻探编号为M122、M123的两处地方进行发掘，在挖开地表深2米多时，两个长方形墓坑就蓦然映入眼帘。墓葬均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M122墓口长4.45米、宽2.6米、深2.15米，而M123墓口长4.4米、宽1.6米、深2.5米。墓中的棺槨和尸骨已腐

朽无存。M122 墓坑只有 1 件陶瓮作随葬品，而 M123 墓坑随葬品达 47 件，而且均是青铜器。可见两者生前的地位和贫富有着较大的差距。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剑、矛、匕首、铍、钺、镞、斧、镢等，几乎全是兵器和工具。器物有明显的中原风格，可能其主人生前曾是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军人。从墓葬结构及出土器物的特征判断，这是两座战国中、晚期墓葬。

考古学家的辛劳和汗水终于证明了沙田河流域曾经是贺州青铜文化的一个中心区，沙田镇附近长达 10 公里的河谷地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区，迄今已知道的除高屋背岭外，还有道西古墓群、马东古墓群、马经塘古墓群。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这一带应是古越人苍梧族的活动范围，那么这些墓葬应与古越人苍梧族有更密切的关系。

由于政治、军事和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两汉以后，政治、经济中心沿贺江向贺州铺门、八步一带集结。汉王朝在今贺州市辖区内设立冯乘县、富川县、临贺县、封阳县，其中临贺县治就在今贺州市区，临贺县就成了当时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中心。

临贺古城址有三处，最早的城址在今八步区贺街镇大鸭村、地名为“旧县肚”的一块平地上，可称大鸭村城址。城东北为丘陵地带，距西约一里为贺江与临水交汇处，属交通要冲。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50 米，南北宽 180 米。四周城墙用泥土夯筑，现仅存北墙和东墙，墙残高 1.5 米，厚 3~4 米。南城墙临贺江古河床，中开一门。东、西城墙外各有一条宽 10 米、深 2 米的城壕。城内地表有大量的汉代方格纹、三角纹陶片和绳纹瓦片。

约西汉晚期，临贺城搬迁至东南距旧县肚古城址约一公里的三角洲，

此地为洲尾村，故又称洲尾城址。城呈方形，纵横约一公里，城墙大部分残毁难辨，仅西段保存长 300 米、厚 4 米、残高 1 米的夯土墙：

东汉初期，临贺城再一次搬迁至今贺街镇的河西街，可称河西城址。城址位于临江西岸，有主城与附城之分。主城占地 510 亩，有东、西、南、北四道城墙，城墙内为夯土墙，外有宋以来历年所砌的包墙残砖。现东垣长 840 米，南垣长 784 米，西垣长 630 米，北垣长 280 米，垣宽达 21 米，残高 2~4 米。砖城墙外北、西、南三面有护城河，东面为临江。在主城外西侧有一附城，附城仅残存汉代夯土城墙一道。

除临贺古城外，贺州还保存有另一处年代更早的古城址。这便是位于贺州市铺门镇河东村北的高寨城址。城西临贺江，周围为起伏的丘陵。城南北长 200 米，东西宽 180 米，东、南、北三面有城墙，城西无城墙，只筑有两层高台。在距城南约 200 米处另有一东北三道土墙组成的小城，小城南北仅长 70 米，东西宽 50 米。两城地表均有较多的汉代陶片、绳纹瓦片。高寨城址一带汉时为苍梧郡封阳县地。据考证，此城建筑年代应在汉初南越国时期，武帝平南越后为封阳县城。

无论是临贺古城或高寨、封阳城，城址周围均分布有大量的汉代墓葬群，反映出汉代郡县所在地确实人口众多，繁华兴旺。1975 年，广西文物队在高寨附近土岭上发掘了九座汉墓，1979 年又在金钟村发掘了一座西汉大型土坑木椁墓，墓葬中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随葬品。

秦汉时期，是贺州市辖区经济、文化发展最迅疾的时期。城市的修建、人口的增多、郡县的设置当与贺州是中原地区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密切相关。在汉代，中原地区进入岭南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湘漓水道，可

经湘江入漓江，由桂江经梧州入西江，下达广州，或上溯转入南流江至合浦。另一条则是潇水—贺江水道，这是一条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的通道。可从湖南进入富川、贺州，经贺江南下梧州、封开直达广州。富川境内至今仍保存有一条古道，有人认为乃是在秦时所开之道基础上扩修而成。这条道路始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进入富川县境内，经麦岭、青山口、黄龙至古城止。陆路全程 170 公里，路宽 1~1.5 米，路面多为鹅卵石，也有用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蜿蜒于萌渚岭、都庞岭山脉丘陵间，北连潇水、湘江，南连富江、贺江和西江，使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借此道得以相连。这条道路的优点也是有两条源头很近而南北分流的河流—潇水与贺江。萌渚岭，又名桂岭。秦进军岭南时，此是通道之一。南越国赵佗曾在桂岭设防，汉高祖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见赵佗，亦从桂岭取道。汉武帝平定南越以后，在萌渚岭与都庞岭之间设置谢沐县（今湖南江永县西南），目的就是控制这条通道，后称“谢沐关”。

由于贺州地处通往中原的咽喉要道，故比广西其他地区更早更多地接纳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得以率先繁华起来。其后，随着合浦出海港口的设立，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活跃和畅通，古代贺州一直都是广西经济发达的重镇之一，历千年而不衰。

## 悠悠漓水关

有位才女是这样描述梧州的：“它有小家碧玉的精致，小桥流水的清秀，而那黑白分明、斑驳陈旧的排排骑楼，分明让我看到这座小城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是的，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内河运输重要港口之一的梧州港，历史

积淀自然是非常厚重的。这里有高阶台地上的打制石器，有苍梧文明，有庞大的汉晋墓群，也有西汉政府设置的“离水关”。面对这些，纵然是富有文采的文人墨客或思想深邃的哲人，骤然间也难以说清楚究竟是梧州承载了历史的厚重还是厚重的历史承载了梧州。

梧州的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至迟于数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梧州市西郊和西南沿西江的丘陵山坡活动。因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广西的考古工作者就在上述区域里发现许多属古人类加工的打制石器。这些古人类算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在梧州这块土地上的拓荒者。他们是一群渔猎、采集者，使用的生产工具很粗陋，是利用砾石为原料，采用锤击法单面打制而成。器型的种类也十分简单，主要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砍砸器是一种能砍断灌木、敲砸动物骨骼及坚果外壳的工具，而尖状器可用于挖掘植物的块根，刮削器则具有切断和刮削功能，是切割纤维、兽皮、肉类的有效工具。这是梧州地区古代文明大厦的底层和基础，其后的灿烂辉煌均发端于此。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商周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在梧州地区的发现，反映了人类活动时间的连续性，并且与舜葬苍梧的历史传说有关。早在商周时期，苍梧族就是活跃在包括梧州地区在内的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民族集团，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今广东肇庆、德庆、怀集、连山、连南、连县、封开，广西的梧州、昭平、平乐、富川、钟山、贺州及湖南江永、江华、宁远等地。周代的青铜器铭文已有“仓吾”二字，“仓吾”即“苍梧”。它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民族的称谓。民族学家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说“仓吾乃古代的南蛮”，《逸周书·王会解》一书中还有苍梧族向中原

王朝进贡翡翠的记载。舜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尽管至今夏朝历史和五帝依然还有待于证实，但人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有“信史”之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确实的记录。《史记》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过于简洁的文字使后人产生了歧义，有人认为“南巡狩”是舜代表中原华夏集团对南边古国的安抚和例行外交与巡视，也有人认为是舜南征直入苍梧，反映华夏集团与仓吾族的战争。无论如何，舜在南巡过程中就死在苍梧这个地方，而安葬在湖南的九疑山。舜的死亡又衍化出另一个令人为之动容的神话：对舜的死亡，最悲痛的人莫过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与女英，她们闻讯追寻到湘江畔，“以涕洒竹，竹尽斑”，自沉湘江，死而为神。因此，后代的诗人便有了“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的美妙诗章。

湖南地区的一些考古新发现，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的历史记载增加了可信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质《地形图》，在九疑山处标有“帝舜”二字；又据新华社2002年5月21日报道：在湖南省宁远县九疑山发现了一处秦汉时期舜帝陵庙遗址。如此年代久远的帝舜遗址的发现，标志着上古时期“五帝”时代，正从传说中逐渐走向了历史。舜是死在苍梧，故苍梧人也立庙祭祀他。《苍梧县志》说“虞帝庙在大云山麓锦鸡岩西，城东西四里许”。该庙唐时已有，故杜甫《暮冬送苏郎兵曹适桂州》诗曰：“岁阳初盛动，王化久磷缁。为入苍梧庙，看云哭九疑。”

汉初，苍梧属南越国苍梧王统辖，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国后，即在南越国苍梧王控制之地，设置了苍梧郡。苍梧郡下辖十县：广信、谢沐、高要、封阳、临贺、端溪、冯乘、富川、荔浦、猛陵。它的

范围相当于今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县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宜以北。广信是苍梧郡首县，广信是县治和苍梧郡治的所在地。

广信县治在哪里呢？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唐初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陈元传》注，李贤说：“广信故城在今梧州苍梧县。”曾任唐岭南节度使的杜佑在《通典》“梧州”条下也说：“苍梧（县），汉广信县城即此。”唐人说广信县治在梧州，可是到了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说汉晋广信县城在封川（即今广东封开县），此后的地方史志才有了不同的说法。不过从梧州、封开两地发现的文物情况看，当以梧州是广信县治所在地的判断更令人信服。据统计，梧州市（含苍梧县）发现的古墓葬约96处，700多座，尤以两汉墓居多。而封开县发现的古墓葬仅一处，约100座。两地古墓葬数量的巨大差距是一目了然的。通常而言，古代大凡越发达繁荣的都市，其所聚居的人口就越多，又因为都市人的坟墓大多修建于距城郊不远处，而鲜有例外者，因此墓葬数量的多寡反映出只有梧州才可能是当时经济政治中心广信县治的所在地。这种现象非常有趣，正所谓活人多，死人也多；死人多，墓葬也多；墓葬多，证明活人也多。

随着汉武帝在合浦设出海港口后，西江水道作为运输来往货物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从梧州的汉晋墓分布和相关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位处商贸通道的梧州当时已成为十分繁华的都市。

梧州汉晋墓群就散布在梧州市东北郊的云盖山、螺山、龙船冲，桂江西岸的莲花山、富民坊、大塘和西江南岸的塘源、旺步、高旺一带，庞大的古墓群包围了整个现代梧州。古墓的总数究竟有多少，至今尚未有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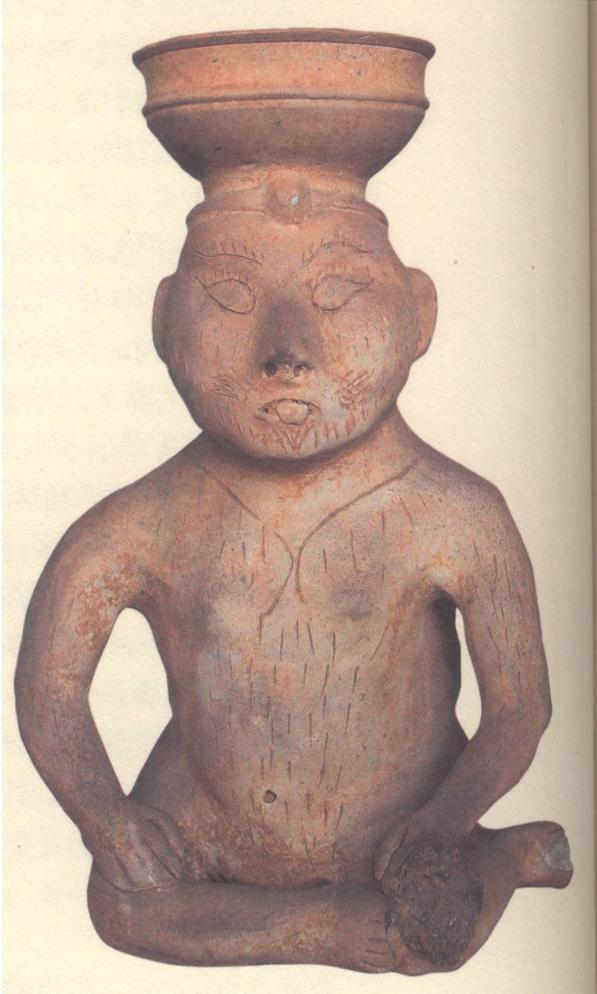
统计，自1958年以来，陆续发掘的古墓葬就有300多座，出土汉晋文物6000多件，除有极少数战国墓外，绝大多数是汉晋墓。

汉代厚葬之风在当时的梧州也同样盛行，因此梧州汉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有炊器如釜、鼎，有盛器如壶、盒、碗，有兵器如刀、剑、矛，有农具如斧、锛……大凡人一生的日常用品能放进墓内的都放进去了，不能放进去的那些房屋、人、车马也做成模型放进去了。随葬品一般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其他质地的诸如金、银、铁、木、琉璃、宝石等再次之。当然，坟墓形制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的多寡，品质的优劣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经济状况有关，有钱有势者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其墓穴也巨大，随葬品也比一般平民多得多。

令人注意的是在梧州西汉晚期和东汉前期墓中，有较多的镌刻花纹铜器出土。如旺步二号墓的铜案，低山西汉墓的龙凤纹长颈壶，云盖山西汉墓出土的龙凤纹针线筒、三兽纹铜镇，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龙凤纹博山炉、羽人纹灯等。这些铜器形态优美，遍体镌刻有繁缛、精细的花纹，每件都是不可多得的高级青铜工艺品，也是岭南地区特有的珍贵青铜器。用这些青铜器随葬的墓主人，生前当是身份地位较高的官吏士族或商贾大富者。这些青铜器在岭南地区只有合浦郡所在地合浦、郁林郡所在地布山（今贵港）、南海郡所在地番禺（今广州）的墓中才有出土。梧州发现如此多的镌刻花纹铜器，不仅是该地曾经为郡县所在地的有力证据，也说明该地曾经经济繁荣，富豪云集。

在梧州汉墓中也出土有一些精美的玛瑙、琉璃、琥珀等配饰，它们应是从合浦港进口的洋货，沿南流江再辗转至郁江输入梧州。已有迹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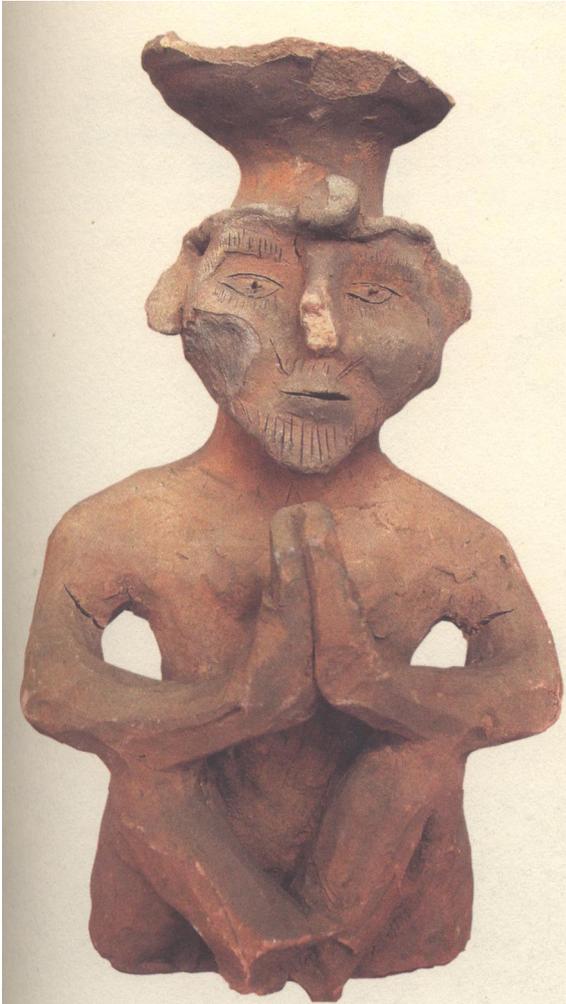
明，随着汉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进入中国的外国人逐渐增多。两广汉墓出土的一些异域人陶俑灯座和侍俑，其形态与中国人不同。这些陶俑所表现的应是有外国人因海外贸易进入中国，而其中一些人沦为奴仆的情形。



■梧州旺步陶俑灯座。这件陶俑高鼻深目，头缠巾，裸体且用细刻线条表现其多毛，其形态特征既非中原人亦非两广人，因此应属来自西方或东南亚诸国的外国人形象。

广州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墓出土有陶俑灯座和侍俑，托灯的俑有男性也有女性，侍俑均为女性，作捧物状。据研究，“这两种陶俑的形象都是头较短，深目高鼻，两颧高，宽鼻厚唇，下颌较为突出，身材不太高，从刻画的胡子与胸毛看，再生毛发达，这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

马来族’接近。这些俑的服饰特点是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侍俑下体着长裙如纱笼，与印度尼西亚一些岛上土著民族的风习相似。但从深目高鼻这一体形特征来看，他们似乎更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的东岸”。



■梧州云盖山陶俑灯座。这件陶俑仍为高鼻深目，但其垂耳相当突出，双足上屈而坐，双掌则合于胸前，极像一个正在打坐的僧侣。这些陶俑应是随汉代海上商贸活动而进入两广地区的外国人有沦落为奴的真实反映。

广西梧州汉墓中亦有汉代异域人陶俑出土，且很有特色。如 1977 年梧州市旺步化工厂一座土坑墓出土的一件陶俑灯座，高 30 厘米，灰黄陶，质坚硬，俑高鼻深目，张口吐舌，络腮胡，身肥胖，肌肉发达，突乳，遍体刻毛，跣足，双腿向一侧盘屈，双手分别按膝，呈坐状，头缠巾及顶托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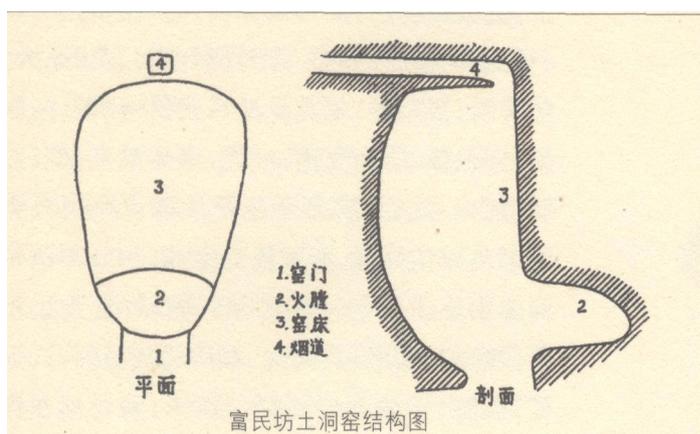
盘，形态极为生动。1958年梧州云盖山出土的另一件陶俑灯座，灯盘及足稍残，残高21厘米，灰褐陶，俑仍为高鼻深目，垂耳，高颧，嘴微开，有胡须，裸体，双足上屈作踞蹲状，双手相合于胸前，头缠巾上托灯盘。东汉杨孚《异物志》曾提及当时的一种“瓷人”，其“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勤劳力”。有人认为，他们很像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或东非人，应当也是被外国商贩出卖的奴隶。

梧州最发达的手工业应是陶瓷制造。早在1962年，考古学家就在梧州富民坊伏尸山一带发现了一处汉代陶窑作坊，分布面积达一万平方米。1975年5月清理了27座。每座窑室由窑门、炉膛、窑床、烟道四部分组成，是一种依山坡而建的马蹄形土洞窑。烧造的陶器主要是釜、锅、罐、瓮，以陶釜最多。陶器胎质坚硬，夹砂，呈灰褐或灰白色。器身拍印一种较粗的方格纹。产品属民间实用器。一些窑室的相互重叠及厚厚的废器堆积昭示窑场使用的时间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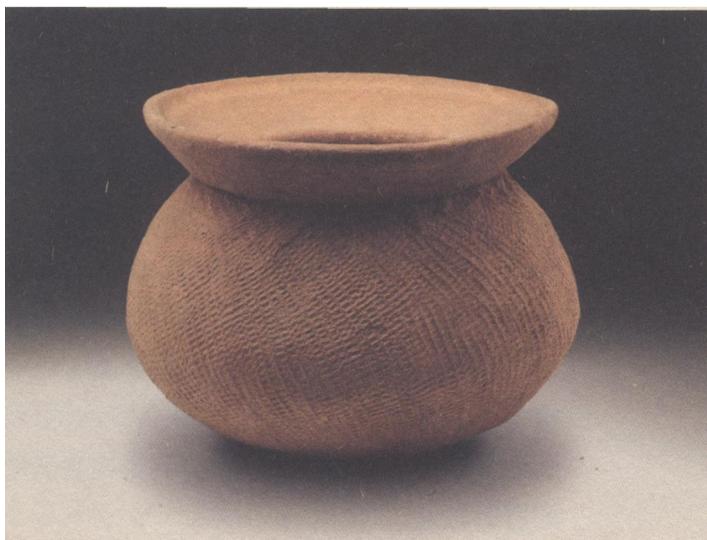
在苍梧县大坡圩也发现了8座窑灶，均为马蹄形土洞窑。窑灶由窑门、火膛、窑床和烟道四部分组成，以烧造罐、壶等日用品为主。器物中一部分装饰方格纹、水波纹、弦纹，一部分施黄釉。施黄釉者，从胎质、吸水率、火候看，已为原始青瓷。年代为东汉早期。

梧州是繁华的通商口岸，汉中央政府便在梧州设立“离水关”，负责过往商旅、货物、征收关税等事务。“离水关”之设当与苍梧郡设立的时间大致相同，故《汉书·地理志》说：“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有离水关。”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漓（离）水关在今梧州市，如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说：“漓水关，在府（梧州）西南，汉苍梧郡有漓水关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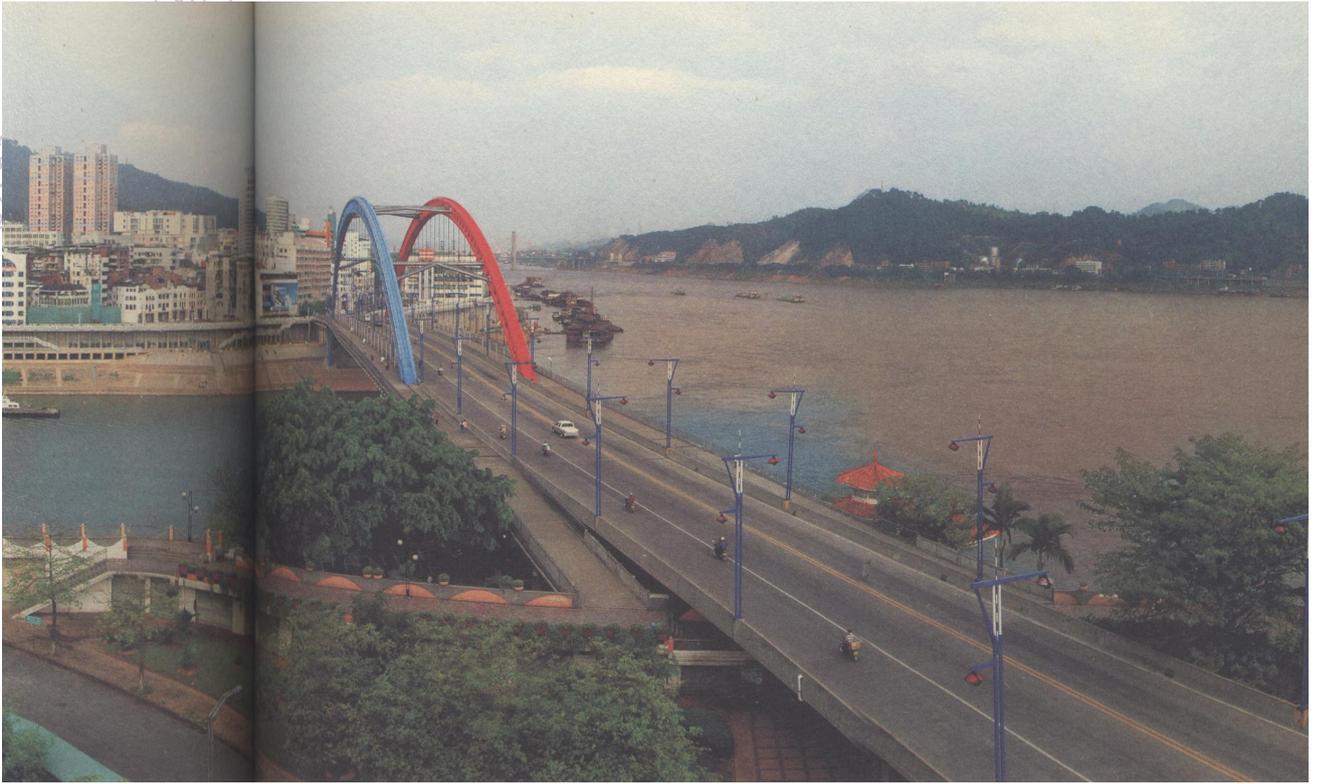
郦道元《水经注》曰：“漓水又南至广信县入郁水。”漓水即漓江，亦是桂江，漓水关即在桂江与西江交汇处附近。两千多年过去了，漓水依然悠悠长流，但漓水关却早已踪影杳杳。有专家考证，认为当年的漓水关就设在今桂江与西江交汇处，即与梧州市三角嘴相对的江面上。当时漓水关应连舟为台建于江中，一关控制桂江及西江的货运通道。



■梧州地区是广西发现汉代窑址较多的地方，富民坊窑址则是年代最早的一处。从左图可见，这是一种依山而筑的马蹄形土洞窑，由窑门、火膛、窑床、烟道构成。



■当时烧制的陶器种类有鼎、釜、锅、罐、瓮等，多为夹砂灰褐陶。1964年梧州富民坊窑址出土的方格纹陶釜，高19.5厘米、口径24厘米、腹径27厘米，侈口，束颈，鼓腹，圜底。腹部及底饰拍印方格纹。厚胎夹粗砂，胎质坚硬。



■梧州是个美丽的临江之市，桂江与漓江在这里相交后便流入西江。汉代时，朝廷曾在梧州设“离水关”，控制桂江、漓江、西江的商贸。据专家考证，当年的漓（离）水关的位置正在这条现代化的梧州大桥下。